

求索集

求 索 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求 索 集

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编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 峨眉)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13

字数: 204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7478·1 定价: 2.00元

序

这里，是一群理论战线上的探索者，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奉献给读者的一本论文集。他们是西南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的部分教师，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分别在各自所从事的学科领域里，进行着认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几年来，他们写作了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等不同课题的论文一百多篇，从中挑选了二十三篇，汇集成册，命名为《求索集》。

“求索”的含义，取自屈原《离骚》中的著名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寻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的。客观世界在不断发展，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生命力正在这里，它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发展，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任何真理的发现，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新的研究成果的获得，都不是轻而易举，俯拾即得的。这是一个艰辛的、劳苦的探索过程。它要求有科学的态度，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意志，孜孜不倦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方法。这里有成功，而更多的可能是失误。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大树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开出了不少不结果实的花，还有许多并非花果的枝叶。删夷枝叶的人，永远得不到花果。倘无失误，何来成功？即使经过一百次失误，而能取得一次成功，对于真理的探索者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探索者的道路是艰难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

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然而有志者事竟成。那些在探索的道路上，默默地，诚实地，迈着自己不停脚步的人们，必将在推动人类认识运动发展的事业中，作出有益的贡献。

万事开头难。《求索集》是作者们在寻求真理的途中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他们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相信他们今后将以更多的收获奉献给读者。

李 泳 1986年4月5日

注：

〔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目 录

序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共产国际

——试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条件张先智 1

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初探

..... 勇淑杰 15

试论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和策

略中的失误.....高 强 29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

的作用及其意义..... 何云安 42

中国共产党与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

..... 邓介曾 50

要造成“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学习毛泽东同志一个重要思想的体会

..... 黄通玉 63

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战场

..... 朱 铃 73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的作用孟秀湘 87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问题

..... 贾志永 95

增强企业活力必须重视消费对生产的

作用孙恒昌 103

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李尚富 116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的论断没有过时

——与杨鲁军同志商榷.....干学衡 130

谈谈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雷国本 139

对指导性计划的再认识张吕兴 146

试论深圳特区的经济体制改革李金营 152

信息社会与人的交往方式郭金平 165

观念现代化问题初探万 勤 177

信息与思维形式化.....谢 徽 190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建立过程的说明徐 律 198

狄德罗建立人类知识之树的方式王浩吾 208

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成因浅析李凤岭 218

新的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杜金铭 224

对宇宙大爆炸理论有关问题的哲学思考

.....陈 光 232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共产国际

——试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条件

张 先 智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正如中国革命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样，都是有其特定的国际条件的，这个国际条件就是“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这精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这个历史条件既包括特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也包括特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二者紧密地联系着。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毛泽东思想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就必须同时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国际条件，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科学的阐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正确地吸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自觉

地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是想就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国际条件作一初步探讨。

(一)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时间大致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从党的成立到大革命的失败，是党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称之为党的幼年时期。他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2〕}这就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因此，幼年的党，当时还不能够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政策。同时，共产国际是一个强调集中领导，实行严格纪律，具有很大权威的国际组织。它集中多，考虑各国特点和各国的实际情况少。当时共产国际派代表长驻中国，帮助和监督中国党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基本地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办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接受和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过程中，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得到提高，开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1.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同年7—8月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列宁的《提纲（初

稿)》和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实际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3〕}。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制订提供了理论基础。共产国际“二大”以后,马林受命来华。1922年1—2月间,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了民族殖民地革命策略方针等问题。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分析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22年6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了革命要分二步走。这个纲领主要是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制定出来的,但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回答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表现。

2.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对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倾向展开批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见解。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表现。

共产国际在东方从事革命活动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到苏维埃的朋友和支持力量。他们不仅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也需要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的支持。因此建立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马林赴华使命的重要之点是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早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思想^{〔4〕}。共产国际“三大”又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会上,列宁亲自会见了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并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10—12月,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东方问题(提纲)》,

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策略^{〔5〕}。接着，共产国际于1923年1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其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重申了国共合作的策略^{〔6〕}。在上述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由于共产国际指示本身的缺点和国际代表及陈独秀等的错误，常常表现出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到大革命后期，突出的表现为右倾错误。比如党的“三大”决议，既反对了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的右倾观点，又反对了张国焘等人的“左”的倾向，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方针。又比如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如何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上也是有斗争的。鲍罗廷和陈独秀执行国际指示，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党内一批同志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反对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的错误。但是鲍罗廷以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支持北伐为条件来换取蒋介石答应反对国民党右派。结果，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现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目的。

3. 初步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开始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也提供了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往往对中国工农力量

估计不足，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孙中山越飞宣言、《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等文件中都有这种倾向。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是否定东方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纲，强调工人运动“年轻”，无产阶级组织“处于萌芽状态”等^{〔7〕}。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政治书记拉狄克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滚出孔夫子的共产主义研究室”，“把工人带到资本主义分子的行列中去！”，“议事日程上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拉狄克的观点是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去追随资产阶级，而不是要资产阶级来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上述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写作《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被后来称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蔡和森指出：“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8〕}邓中夏讲：“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9〕}实际上，党的“三大”也接受了这种思想^{〔10〕}。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区分敌我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因此我们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11〕}。而在党的“四大”前后，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批评了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观点。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文章吸取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因素，集中了党的正确意见，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又一重要表现。

4. 党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党的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民问题上提出并阐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北伐战争中支持过中国的农民运动。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六次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了农民问题，提出共产党员的基本任务是把农民群众吸引到战斗口号下的积极斗争中去^{〔12〕}。在当时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及时而重要的。1926年鲍罗廷曾“赞成急进的土地政策。”2月他在北京给布勃诺夫观察团的报告中曾强调了农民问题^{〔13〕}。10月，鲍罗廷又给黄埔第四期毕业生作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报告^{〔14〕}。

但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有错误的地方，如“土地国有”、“自上而下”、防止农民运动“过火”等指示。北伐战争前夕，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从这时开始，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和发动，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等都一再著文阐述农民问题。毛泽东等还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党提出了“耕地农有”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等。192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是中国历史第一篇最有份量的、为农民说话的历史答辩书。徐特立从这篇报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回忆说：“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渺乎小矣！”^{〔15〕}历史的发展，把

农民问题推到现代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期来解决，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表现。

在1926年11月到1927年5月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是继1920年列宁阐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后又一次重大发展，其中许多思想是非常杰出的，如“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16〕}，“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两个革命巨流的汇合”^{〔17〕}，“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8〕}等等，在理论上使中国共产党人耳目一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把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到日程上来，所以土地革命无法进行。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挥上的错误，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二)

毛泽东思想形成阶段，时间大致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

在这个阶段内，共产国际纠正了大革命后期的错误，实现政策上的转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导致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党内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大革命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但是在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指示这个问题上，党内仍然严重存在着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把马克思主

义教条化，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尤为严重。当然，党内这种幼稚病的流行，一方面是与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的错误有直接关系，给中国党带来教条主义泛滥的后果；另一方面，王明不懂得中国革命实际，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号施令，这也是造成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在中共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场斗争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19〕}同样地，由于中国情况不同于西方，它所进行的革命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进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独立地去探讨马、恩、列、斯的理论。毛泽东的可贵，是他较早地觉悟到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要独立思考。毛泽东在接受党的委托，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对国际指示采取分析态度，努力做到从实际出发，独立地开展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独特经验，以形成带有自己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叫《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告诉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这表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篇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精神的珍贵文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

中所作出的概括和总结。

2. 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问题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从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20〕}中间派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底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必须“揭露国民党底一切派别，‘改组派’当然也在其内，使大家知道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底狗。”^{〔21〕}实行“左”的土地政策，“旧业主不应该得到任何分地”，富农“不给以好的土地”^{〔22〕}。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从中国实际出发，重复国际“左”的政策。他们在规定中国革命任务时，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这就必然要犯“左”的错误。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典型、更突出。他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否定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由于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一切可能成为党的同盟者团结起来，就不可能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的各派各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使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陷于孤立而失败。

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采取了分析态度，抵制了它的错误观点和“左”的政策。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和中央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

剥削。”^{〔23〕}又说：“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24〕}凡此种种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3. 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开始的，党的“八七”会议就是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召开的。执行共产国际上述转变的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从1927年下半年起到1928年底，党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党的大批骨干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摸索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这时，毛泽东第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作用，他带领秋收起义剩下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在此期间，朱德、彭德怀先后率军前来，组成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力量，并在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中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建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从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春夏，全国红军扩大到近十万人并且建立了十多块根据地。由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这已经可以说明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大革命失败后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通过革命实践，毛泽东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